

# 探析“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形成及其制衡博弈

屈彩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摘要** 21世纪以来,亚太格局发生着新的变化。随着2006年“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的提出,日美澳印四国迅速拉近距离,开展紧密合作。这不仅由于亚太地区有着萌生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的背景,而且由于日美澳印四国有着奠定战略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更由于日美澳印四国有着推动战略合作的多重动因。“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四国在遏制中国这一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博弈。

**关键词** 日美澳印 四国联盟 战略合作构想 亚太地区安全格局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6)01-0164-06

DOI:10.16197/j.cnki.lnupse.2016.01.020

当今,在亚太格局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就是日、美、澳、印四国愈益密切的战略合作。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世界经济大国日本、世界中等国家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大国印度,这四国逐渐形成了松散而又极具辐射力的合作框架。该战略合作已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成为亚太舞台的焦点之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不仅牵引着亚太安全格局的神经系统,而且严重影响和挑战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构建。

那么,日美澳印四国缘何走到一起?在日美澳印四国中,美、日、澳三国处于同一同盟体系,三国的紧密合作由来已久,是亚太传统安全格局中核心的部分。但是,美、日、澳三国与印度并没有传统上的紧密合作历史。战后以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与印度分别属于西方和东方两大阵营。日、澳两国作为美国的同盟国,采取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三国合作逐渐增强。虽然美国曾一度试图拉拢印度抗衡苏联,但是印度始终坚持亲苏的外交政策与路线。因此,在冷战时期,美、日、澳三国与印度关系较为疏离,并没有建立起紧密的双边关系,战略合作更无从谈起。但是,21世纪以来,随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的提出,四国却迅速拉近距离走在一起。究其缘由,日美澳印四国能聚在一起暨推进战略合作是在特定的背景、前提下,由多重因素共同推动和作用的结果。

## 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背景

21世纪初,亚太地区力量中心对比出现新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成为21世纪亚太格局变动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亚太多极化趋势和亚太地区力量中心对比的变化引起了亚太格局的急剧变动。就是在这样剧烈变动与不断重整的亚太格局变化的背景下,亚太国家之间的互动出现了新的调整。其中,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逐渐加强双边关系与合作,安倍更在2006年提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推进四国战略合作。

一方面,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冷战结束后,旧的世界格局瓦解,新的世界格局还未形成,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剧。在亚太地区既有超级大国美国,又有跨

收稿日期 2015-08-16

作者简介 屈彩云,女,山西大同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 大国关系。

欧亚大国俄罗斯,也有地区大国中国、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区域共同体东盟、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南亚地区大国印度以及中亚国家等等。其中,中国、俄罗斯、印度、韩国、东盟等国成为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除了传统的大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着主导的角色外,其他国家在亚太格局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亚太地区力量中心对比发生新变化。亚太地区是大国和众多力量中心云集之地,也是这些国家角逐利益和进行博弈的阵地。超级大国美国仍保持着一超多强的态势,并不断加强其亚太战略部署,在加强传统盟友关系的同时,实现其制约日本、遏制中国、俄罗斯,拉拢东南亚国家,维护其亚洲霸主的意图。但美国霸权在层出不穷的全球和地区问题冲击下,已显得力不从心。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正被一个多极世界取代,在多极世界中,美国仍然会作为最重要的强权之一而存在,但是却不得不和其他新的正在崛起的全球超级强权和地区强权分享地位<sup>[1]</sup>。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sup>[2]</sup>,美国霸权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呈迅速崛起的态势。从2000年至2006年,中国GDP增长率为8.4%、8.3%、9.1%、10%、10.1%、11.3%、12.7%,呈直线上升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由第六位晋升为第四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正成为亚太地区日益强大的力量中心。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更引起了霸权国美国以及亚太周边国家的警惕。虽然,基辛格强调:“21世纪中国的‘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既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依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行事的现代大国。”<sup>[3]</sup>但是,美、日、澳、印等周边国家仍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与警惕。

俄罗斯的实力逐渐增强,在维护其传统势力范围的同时,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不断融入亚太,加强与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东盟等亚太国家的合作,不断提高在亚太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截至2006年,日本加快了追求政治大国化的步伐,加强了与中国的竞争,并开始寻求遏制中国崛起的种种策略。虽然仍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经济处于长期低迷状态,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的困境中,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岌岌可危。

印度经济增长加快,其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不断上升,2006年位居世界第十。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印度也开始崛起,积极推进“东向战略”,不断加强与亚太大国和地区国家的合作,追逐大国梦。

此外,澳大利亚也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在亚太地区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而东盟也积极开展多方位外交,加强了与亚太国家的合作,推进自身区域共同体建设。

随着中、美、俄、日、印、东盟等亚太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亚太格局呈现出新的变化。许多国家的主要经济伙伴和主要安全关系相互分离,这成为地区层面的一个普遍现象,意味着东亚地区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明显分离的二元格局<sup>[4]</sup>。经济上,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与亚太地区国家经济合作持续加深,并由此带动了亚太经济整体的快速增长以及亚太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安全上,美国仍主导着亚太安全格局,冷战的阴霾时不时笼罩在亚太上空,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不断升级和恶化,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现,亚太传统安全格局面临着挑战。随着中国崛起,亚太格局中已经崛起国家和正在崛起国家之间的博弈态势日益激烈,亚太大国和地区国家开始了新的战略调整。美日澳印四国为了维护、重塑和角逐变动着的亚太地区秩序的权利和利益,逐渐加强战略合作。

## 二、“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前提

日美澳印四国虽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但是四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认同和海洋国家身份认同。这为四国战略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一方面,日美澳印四国拥有基本一致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认同。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典型国家,也是

最早将三权分立宪法化的国家。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单独占领下进行了美式化的民主改革,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和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保持一致。而澳大利亚和印度在近代英国殖民时期,就移植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模式。作为英联邦成员,澳大利亚和印度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认同上与英国保持一致。而美国和英国同文同种,有着共同的政治传统和思维习惯。因此,美日澳印具有基本一致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认同。虽然在人权等问题上,美印、日澳之间存在分歧,但是四国在民主、自由、法治、市场等基本政治制度与价值认同方面是一致的。共同的价值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因价值观不同所导致的战略顾虑与猜疑,有助于加深四国在身份认同上的亲近感,成为密切四国关系的天然纽带。

另一方面,日美澳印拥有共同的海洋国家身份认同。马汉在其“海权论”中曾指出,“英、日、美绝对对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于海军方面”〔5〕。麦金德在其“枢纽论”中指出:“世界的边缘陆地有两个同轴的新月地带,一个是内新月形地带(或边缘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带曾经哺育了欧洲、中东、印度和中国伟大的历史文明。还有一个是由南北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澳大利西亚<sup>①</sup>组成的外新月形(或海岛新月形)带。”〔6〕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为处于外新月形带的海上国家,印度为处于内新月形带的由部分大陆和部分大洋组成的国家。根据马汉和麦金德的陆、海国家划分,美日澳三国显然是海洋国家,而印度是拥有广阔海岸线的大陆国家。战后以来,美国始终占据着世界第一海洋强国的宝座。日本在与海洋大国美国结盟的同时,不断加强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了海权的构建。而对于曾追随英国、又与美国结盟的澳大利亚而言,海洋国家是其国家身份认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印度自独立以来非常重视海洋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对印度洋的控制。印度海权之父潘尼加认为“印度的未来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7〕21世纪以来,印度随着自身崛起日益增强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与建构。这种海洋国家身份认同缩短了地理距离造成的隔膜,加深了美日澳印四国的地缘身份和地缘战略认同。

### 三、“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基础

战后,美国分别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了同盟,在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进行紧密合作。虽然在冷战时期日美澳三国与印度的关系较为疏远和隔膜,但是自冷战后三国与印度逐渐加强双边关系,开展合作,这为日美澳印四国进行战略合作奠定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在日美澳印四国之间,不仅作为同盟的日美、美澳关系不断强化和深化,而且日澳关系也不断增强和密切,日美澳三国与印度的关系也不断提升和加强。

一方面,美日澳三国的关系日益巩固和深化。自战后以来,日美、美澳建立了稳固的同盟关系。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南北锚,日澳在冷战时期紧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美日澳不仅在冷战时期进行了密切的配合,而且在冷战后更进一步升级同盟机制与功能,在亚太乃至全球进行紧密的战略配合。特别是随着21世纪以来日澳关系的增强,日美澳形成了稳固的铁三角同盟。美日、美澳同盟纽带以及日澳准同盟关系,使美日澳在政治、安全与战略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全球安全问题上,特别是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三国保持着高度的战略认同,这成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坚实的现实基础,也使“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具有了一半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美日澳三国与印度的关系不断加强。美日澳三国与印度的关系自战后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冷战时期,美日澳三国与印度分属不同的阵营,其与印度的关系平淡而疏远。虽然,美日澳三国与印度之间存在西方与东方两大阵营的战略对抗,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热战对决。随着苏联解

① 澳大利西亚(Australasia),一个界限不太明确的地理名称,这里指马来群岛和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译者

体和冷战结束,陷入失落与困境的印度积极调整对外战略,改变传统外交路线,提出“东向政策”,开展立足、主导南亚,重视、融入东南亚,面向全球的全方位务实外交,主动改善印美关系。作为冷战赢家的美国逐渐调整亚太战略,减少在亚洲的驻军,更多依靠盟友维护其在亚太格局的霸主地位,在对华继续采取遏制战略的同时,开始加强对印度的关注。日澳两国也积极调整对外战略,逐渐加强对印度的关注。美日澳三国与印度的关系得到较大的改善和发展。然而,1998年印度核试验问题对其与美日澳三国的关系造成重创。美日澳三国对印度的严厉谴责与制裁,使其与印度的关系降至冰点。但在21世纪初,美日澳三国积极改善对印关系。2000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印度,两国关系逐渐缓和,建立了“持久的、政治上有建设性、经济上有效益的”新型伙伴关系。7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时隔11年访印。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访印,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球伙伴关系”。随着美日澳与印关系的解冻,三国与印度的关系重新步入正轨。其中,美印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于2004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签署《防务关系新框架》。日美澳印四国关系的发展与密切,不仅避免了因敌对而产生的战略障碍,更为四国的日益靠拢奠定了现实基础。

2004年,印度洋发生海啸事件。欲拉拢印度的美国以此为契机,倡议由“美日澳印”四国海军组成核心集团应对救灾。通过印度洋海啸救灾活动,美、日、澳、印四国进行了密切有效的合作,并被广泛地认为是四国同盟的到来<sup>[8]</sup>。以“救灾”这一具有道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为纽带,美国把印度与美国的同盟国日本、澳大利亚拉到一起,实现其同盟国与非同盟国共同合作的尝试,传递着“美日澳印”四国合作的信息。

#### 四、“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制衡博弈

基于共同的和不同的战略利益,日美澳印四国渐行渐近,加强战略合作。在阻遏和制衡中国的同时,日美澳印四国推进本国对外战略,在亚太动态博弈中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 (一)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美国虽然仍为世界霸权国,但是其也无法摆脱霸权周期的结构性困境,呈现相对的衰落。特别是反恐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霸主美国力不从心。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国不断谋略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在亚太,美国开展前沿部署战略,加强与同盟国和伙伴的合作。而亚洲经济的强劲增长和中国的崛起,加剧了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继而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深化与传统盟友日、澳的合作的同时,美国又不断拉拢印度,巩固和夯实其亚太战略部署,遏制中国崛起,维护其在亚太安全格局的主导地位。

被称为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追求政治大国,推进国家正常化。但是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的泥淖中。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从亚洲领头雁地位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跌落,无论从其失去的二十年的国内困境还是从其日渐陨落国际窘境出发,都需要急于改变现状,扭转其在亚太的困境,重塑其在亚太的角色。因此,日本积极调整对外战略,在增强日美基轴的同时,积极开展多边安全外交,加强与澳、印等国的合作,构筑以日美为核心的安全合作框架,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围堵,重塑其在变动的国际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澳大利亚自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中等强国论”以来,一直积极构建中等强国的国家定位。冷战后,一直以“西方一员”进行身份认同的澳大利亚重新思考其地缘身份,重新确定自身为亚太国家的身份认同。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亚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澳大利亚加快了融入亚洲的进程。通过加强与美日印中等亚太国家的合作,澳大利亚积极融入亚洲,构建中等强国,攫取亚太格局变动中的权益。

印度是南亚地区大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东向策略”以来,印度就开始沿着该战略轨迹追求大国梦。事实上,曾经古印度帝国的辉煌历史与文明,使大国梦一直深深扎根于印度的传统与当代外交思维中。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提出,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

国,要不就销声匿迹。基辛格也强调:“印度的目标是在从中东到新加坡,再往北到阿富汗这片几乎横跨半个世界的地区建立起以均势为基础的地区秩序。”〔9〕21世纪以来,追逐大国梦的印度加快了东向战略的步伐。重点是加强与美、日、澳的战略合作,这不仅是其东向战略的重要步骤和阶段,还是其步入亚太、塑造其在亚太地位与角色的重要平台和工具,更是其攫取亚太格局变动的权益、实现大国梦的重要支点和路径之一。

## (二) 阻遏与制衡中国

阻遏与制衡中国是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日美澳印四国遏制、平衡中国的姿态日趋鲜明。

美国是霸权国家,不断遏制任何一个地区国家的崛起,防止对其霸主地位的挑战。自战后以来,美国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采取遏制战略。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中美也伴有朝鲜战争这一热战的发生。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美国遏制的重点对象转至中国。通过重新定义美日、美澳同盟,美国加强对中国的遏制。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的强劲崛起,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崛起。

日本对于邻国中国的崛起,持有失落和难以接受的复杂心态。自近代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步入近代化,挤入西方列强,发动侵略战争,称霸亚洲,并在战败后重振经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强中弱的格局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随着2008年中国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日强强成为现实。而难以接受这一现实的日本,急切地拉拢美、澳、印等国构筑反华联盟,围堵阻遏中国的崛起。遏制中国已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

澳大利亚对于中国崛起则持有平衡的心态。战后以来,中澳分属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中,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虽然冷战结束,中澳关系与合作日渐增强,但对于中国的崛起,澳大利亚仍未能改变冷战思维和地缘戒备心理。然而,中澳之间并不存在战略竞争。近几年来,澳大利亚的对华认知明显改变。在2013年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明确表示欢迎中国崛起,并提出不将中国视为对手〔10〕。

印度是中国的邻国。在冷战期间,中印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了一定的合作。但中印存在领土之争,并发生了战争,导致双边关系紧张和恶化。冷战后,中印关系得到改善。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印关系与合作不断增强。但对于中国的崛起,印度始终持有警惕的态度,并积极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战略合作,平衡中国。

## (三) 日本的积极倡导和推进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启动和发展,应该说是在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积极倡导与推进下完成的。一方面,安倍不仅提出和倡导“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而且积极发展该战略合作构想。在2006年提出该战略合作构想以来,安倍又于2013年提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战略合作构想,充分利用其执政的平台,积极完善四国战略合作。另一方面,自2006年以来,日本从不同层面推进四国战略合作。在双边层面上,日本不断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双边关系与合作。随着日本放松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日本将扮演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和发挥更大的功能,进一步强化和深化日美同盟。同时,日本积极增强与澳大利亚的合作,将双边关系从2007年“本地区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提升为2008年“全方位的战略、安全、经济伙伴关系”,2014年再次提升为“新的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从而推动两国从美国主导下的间接盟友走向准盟友关系。而且,日本积极加强与印度的合作,2006年将两国关系从“21世纪全球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2014年又升级为“特别的战略全球伙伴关系”,打造印日蜜月期,构筑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在三边层面上,日本积极推进“日美澳”、“日美印”三边战略对话与合作。在四边层面上,日本积极推动召开了首次四方战略对话,虽然自2008年以来,该战略对话陷入沉寂,但日本试图重启该四方战略对话的意图仍在持续。

随着战略利益的趋同,日美澳印四国跨越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地域界限,不断加强合作,构建紧密的关系。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作用和催化下,“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不断发展和推进,并逐渐成为亚太安全格局中的多边合作框架。

总之,“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世界霸主与地区大国、中等国家进行的战略调整与重组,反映了亚太地缘经济与政治变化。虽然目前四国还未形成正式联盟,但并不排除这一可能的发展趋势。该战略合作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形成严重挑战,其发展趋势值得进一步关注。“日美澳印”战后合作充分验证了国际关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铁的法则。

#### 参考文献

- [1]瓦里西斯·福斯卡斯. 美国的衰落[M]. 贾海,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29.
- [2][3][9]亨利·基辛格[M]. 胡利平, 林华, 曹爱菊,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286、267-268.
- [4]周方银.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的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J]. 当代亚太, 2012(5):10.
- [5]马汉. 海权论[M]. 萧伟中, 梅然,译.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7:239.
- [6]杰弗里·帕克. 20 世界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M]. 李亦鸣, 徐小杰, 张荣忠,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2:19.
- [7]潘尼加. 印度和印度洋 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M]. 德隆, 望蜀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35.
- [8]“How to go global: a quiet revolution is occurring in what America expects of its friends”[EB/OL]. Economist. March 23, 2006. <http://www.economist.com/node/5662702>.
- [10]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EB/OL], Canberra, 2013, p.25,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_2013\\_web.pdf](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_2013_web.pdf).

## On the Foundation and Check and Balance Game in Japan- US- Australia- India Strategic Cooperation

QU Caiyun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and Glob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Asia-Pacific pattern has undergone new changes. Since the conception of Japan-US-Australia-India strategic cooperation was put forward in 2006, the four countries have an increasingly closer cooperation. This is partly because there is a cooperation background for the four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partly because there are prerequisite and multiple motives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among them. In the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of containing China, the cooperation is in essence a strategic game of maximizing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Key Words:** Japan-US-Australia-India; Quadruple Alliance; the conception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security pattern in Asia-Pacific region

【责任编辑 孙 琰】